

社会转型与执政党的建设研究丛书

主 编 陈方勤 副主编 祝灵君



*Social Capital
and Party Building*

社会资本与政党领导
——一个政党社会学研究框架的尝试

祝灵君/著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阶段性成果（批准号：08JC810001）
国家社科基金09年一般项目课题阶段性成果（批准号：09BZZ001）
第44批中国博士后基金资助出版（批准号：20080440282）



*Social Capital
and Party Building*

社会资本与政党领导

——一个政党社会学研究框架的尝试

祝灵君/著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资本与政党领导:一个政党社会学分析框架的尝试/祝灵君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5

(社会转型与执政党建设研究)

ISBN 978-7-5117-0272-2

I. ①社…

II. ①祝…

III. ①中国共产党-执政-研究

IV. ①D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58310号

社会资本与政党领导:一个政党社会学分析框架的尝试

出版人 和 龔

策划编辑 韩继海

责任编辑 高立志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36号(100032)

电 话 (010)66509360(总编室) (010)66509246(编辑室)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66130345(网络销售)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317千字

印 张 20.25

版 次 2010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48.00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总 序

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决定当代中国社会的前途和命运。在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党的建设需要破解和创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很多。因此，党的建设问题也理所当然地得到全党上下和广大群众的高度关注，成为广大理论工作者、实际工作者研究、探索、实践的重大而热门的课题。人们从各个层面、各种视角探索在新形势下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特别是广大实际工作者以很大的热情和高度的责任感实验、探索党的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今天，党建研究出现了一派十分可喜的少有的繁荣景象。我坚信，只要我们按照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贯彻落实执政党自身建设的基本理论、基本经验和优良传统，勇于探索和破解当前党的建设的难点和重点问题，就一定能够切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由陈方勖同志主编的《社会转型与执政党的建设研究》丛书，选题视角新，适应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有较强的时代感和针对性。今天，我们党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转型期。这就是说，我们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决定了党对国家和社会建设新的路线、新的政策和新的目标，推动了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即：中国正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和信息化社会的转型，从传统的乡村社会向城市化社会转型，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从简单结构向多元结构转变，等等。这种党所处的

历史方位的变化和中国社会的转型，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包括党的建设带来了从未遇到的新问题、新挑战。所以，把握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中国社会转型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是观察和研究当今中国政治生活一切社会问题的出发点和前提。离开了这个大背景，就有言不对路、甚至迷失方向的可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从社会转型这个背景入手，就抓住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切入点，有利于深化党建理论研究，进一步探索和认识执政党自身建设的客观规律，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研究的科学化水平。

《丛书》的第一辑推出了陈方勖、祝灵君、王勇兵三位年轻同志撰写的三本书，体现了他们以开拓创新的精神，探索研究社会转型背景下党的建设问题的最新成果。他们那种直面现实、勇于实践、积极进行理论思考的精神是值得称道的。

这三本书各有特点。陈方勖的《转型社会中的中国共产党》，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梳理了当前执政党建设的几个热点问题，如社会转型背景下的执政风险、社会转型背景下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更新、社会转型对执政方式创新的要求、社会转型对进一步推进党内民主的要求、社会转型对基层党组织的挑战、社会转型如何影响党内文化、社会转型对反腐倡廉建设的挑战、社会转型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新要求等等。全书逻辑清晰，前后连贯一体，对转型背景下党建研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作了总体思考。同时，全书还提出了一个逻辑前提：一方面，执政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所处历史方位的变化推动了社会转型；另一方面，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社会转型进入的新的阶段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这二者互为因果关系。看完全书给人的感觉是：社会转型与政党所处的历史方位融为一体，没有简单地就“转型”谈“转型”，没有“两张皮”的感觉。全书观察问题的视野比较开阔，分析和论证深入细致，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祝灵君的《社会资本与政党领导：一个政党社会学分析框架的尝试》，依然是探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党的建设的问题。作者以政治学（或社会学）中的社会资本理论为视角，构建了一个从领导革命的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新的分析框架。一般说来，如果我们从政治革命的眼光看，中国共产党从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结束就开始了由领导革命的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可是作者却另辟他途，从政治革命和国家建设的对应面——社会革命、社会建设入手，

分析了从领导革命的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另一幅图景。作者认为政治革命夺取国家政权的任务在1949年基本结束，但社会革命的进程仍在继续并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前夕。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革命的思维才开始转向社会建设的思维，同时国家建设的任务由此转向社会建设，这个转变是领导革命的党走向执政党的内生逻辑。看完这本书，给人感觉这基本上是一个政治社会学的研究成果，融合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大量的党史背景材料和政治学的分析概念。由本书给人的启示是：当前我们确实需要从社会问题入手来研究党建问题，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许多社会问题由于我们不够重视或处理不及时、处理方法失当，最后却演变为政治问题或党的建设的问题。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比较赞成作者提出的党建研究应该由关注党与国家、党与市场的关系进一步扩展到关注党与社会的关系，作者提出的政党社会学分析框架也颇有见地。

王勇兵的《党内民主制度创新与路径选择：基于基层和地方党内民主试点的实证研究》，以大量翔实的案例调研为出发点归纳总结了改革开放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党内民主发展的基本历程以及党内民主探索的路径选择。同时本书还把党内民主的探索与国际视野结合起来，用实证的研究方法，娓娓道来，让人在个案思索与国际比较的视野中深化了对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的基本规律的认识。读完全书，给人的感觉，这是一本近年来较为全面、系统地研究党内民主的专著，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

对这三本书能够先睹为快。当然，我想对这个领域的研究恐怕还只是个开头，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学者在这个领域深入拓展、收获更丰硕的成果。以上这些文字算是对本丛书的粗浅之见，不敢称序，但为肺腑之言。最后还需说明的是，既然是探索破解未来的东西，必然不会是完善的。著作中存在的不足、缺陷是难免的，至于对该丛书的价值或存在的不足，最终还是留给广大读者去评论。

蔡长水
2010年元月

自序

近代尤其是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变迁是一个由被动现代化向主动现代化转型的过程，其主要标志是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或“党”）领导的一场影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革命，这场革命本身也构成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在被动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被纳入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所构建的全球体系，成为经济上受盘剥、政治上受欺诈、文化上受渗透、国家领土被侵吞、人民生命与财产安全得不到保护的落后国家。正是在这种国弱民穷的环境中，中共提出了一个响亮的革命口号：“打碎旧中国，建立新中国”。受其鼓舞，无数仁人志士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取得革命成功，开始了独立自主地探索现代化道路。

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共革命的政治涵义及“革命后社会”中的国家建设（nation-building）已被许多学者所论述。但是，对这场革命以及革命成功后的社会改造方面的含义却鲜有人充分论述，更不用说从逻辑上讲清楚中共自革命以来领导思维调整的历史轨迹了。正是针对这个缺憾，本书力图弥补当代中国政党领导研究中缺少对社会层面关注的不足。那么，弥补这个缺憾而选择的切入点是什么呢？是社会资本。因为，一切领导活动都需要社会资本，它不仅体现为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也体现为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良好的人际关系总能影响领导者的领导绩效。政党领导也是这样，它不仅需

要联系社会各个阶层，也需要鼓励各个阶层之间的诚信与合作，形成和谐、团结的社会局面，以增强社会自我管理能力，降低领导成本。从这个角度上说，政党领导需要利用或投资社会资本，这个现象自政党存在以来就有了，只不过不被很多人关注罢了。

本书以社会革命与社会建设（而非政治革命与国家建设）为对象，分析中共引领社会改造、社会发展的历程，展示其从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另一幅图景。正如一些学者所言，“随着我国社会转向经济建设的中心工作，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现实得到确认，共和国的政治形态逐步从革命政治向着建设政治、从运动政治向着治国政治回归。”^①“这种革命性的变化也直接作用于中国政治的建设和发展，并逐步改变其内在的逻辑：即将政治的逻辑起点从国家逐步移向社会，从而使政治运行和发展的形态从革命形态转向建设形态。”^②在社会革命、社会建设和政治革命与国家建设的比较中，如果说前者更多地展示了政党在社会网络中活动的身影，后者则是政党如何夺取或使用公共权力；如果前者更多地与民间“叙事”和民众生活原型相关，后者则与政治“规范”和国家权力运行紧密相连；如果前者与老百姓的生活更接近，后者则融入国家、政府事务之中。因此，假若把“革命、建设与改革”看作中共领导政治革命和国家建设的“三个阶段”，社会革命与社会建设则是中共领导社会改造与社会发展的“两个主题”。在“三阶段”中，中共的领导思维是“继承”与“发展”关系（这可以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报告中看出），而在“两主题”中却是“主”与“次”的关系。邓小平同志讲，“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共的领导思维转向了以社会建设为主，但打破陈规陋习等社会革命思维依然存在，不过不占主要位置。

与国外政党不同，中共成立之初其“基因”中就包含着远大的社会革命理想与信念，即建立一个既符合传统精英所追求的“大同”理想又能反映人

^① 王浦劬：“从阶级斗争到人民共和：我国政治学研究的逻辑转换析论”，《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② 林尚立：“相互给予：政治学在中国发展中的作为”，《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类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独立、自强愿望的理想社会^①，并在建国之后把这种理想上升到国家与全民族的高度。于是，为了实现通过政治革命夺取并改造既有政权的目标，在社会革命中，以家庭为载体的社会规范、社会网络以及传统官僚陋习、现代官僚主义都成为革命的对象。比如，破除以家庭为载体的“私德”体系，建立以共产主义道德为基础的“公德”体系；破除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的“差序格局”，建立以集体生产生活为基础的“集体格局”；破除一切组织中的等级制结构，建立平等的人际关系，等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农村倡导干部下基层，在企业中推行“鞍钢宪法”。因此，革命塑造了“集体格局”，也塑造了新型的“同志”式的社会关系（“同志”是那些具有共同革命目标和价值观的人们的一种彼此间的称谓）。与“差序格局”相比较，“集体格局”中的社会关系具有“普遍主义”特征，而不同于“差序格局”中的特殊主义，由此使社会资本结构发生了整体性变迁。^②

社会革命与社会建设的逻辑起点在哪里？在于传统农业社会中以家庭为载体所形成的以“差序格局”为特征的人伦规范与交往格局，这是传统中国社会资本的初级形态，也是最基本的形态。而这种社会资本形态既是社会革命（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对象，也是社会革命可资利用的组织资源（如对会党、工会、流民组织等的引导并发展其为革命力量）；既是社会建设力图克服的具体障碍（如“差序格局”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也是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文化资源（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某些传统人伦观和道德观的吸收等）。在本书的论述中，社会革命终结了家庭的经济与社会职能，建立了农村人民公社和城镇单位体制，并在“文革”中几乎引致国民经济崩溃；社会建设既恢复了家庭的生产功能，同时也

① 例如，中共在一大的纲领中就提出：“我党采取苏维埃的形式，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宣传共产主义，承认社会革命为我党首要政策，坚决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的党派断绝一切联系”，在二大的最高纲领中则提到，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

② 美国汉学家傅高义（Era F. Vogel）认为朋友关系代表一种特殊主义的人际关系和道德准则，而同志关系则代表一种普遍主义的人际关系和道德准则。这种同志式的普遍主义人际关系的基础，就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的价值标准与理想。参见 Vogel, Ezra F., “From Friendship to Comradeship”, *China Quarterly*, 1965, Vol. 21.

释放了以家庭为载体的“私德”体系；既创造了经济繁荣，也给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带来了新问题，即“熟人社会”的礼仪规范、交往结构与“陌生人社会”之间的冲突。

从社会资本的角度看，在社会革命的思维中，中共善于利用和投资社会资本，建立平等的人际关系，实现以共产主义新人为主体的“集体社会”的理想目标；而在社会建设的思维中，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表明了其对投资社会资本提出了新要求。从结构上看，必须克服以“血缘、地缘”为联结纽带的狭隘、封闭的交往体系，演变为以“阶层划分、利益相关人、生活与生命共同体”为基础的联合体，实现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由“差序格局”、“集体格局”向以人为本的“团体格局”的转型；从规范上看，以“熟人”为载体所形成的“私德”体系必须向以“陌生人”为载体的“公德”体系转型，需要发展出规范“陌生人社会”而不是“熟人社会”的一系列道德标准和法治准则。因此，本书的逻辑路线图就围绕着“家庭——超越家庭所形成的单位社会和人民公社体制——解放家庭——建立以人为本的‘团体社会’”这条主线来展开。

二

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不仅意味着对社会革命的领导思维的调整，也意味着社会建设的任务更加突出。在社会建设中，中共不仅承担了建立现代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的历史使命，而且确立了建立一个互助诚信、文明礼貌、生活宽裕、繁荣稳定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当然，后一目标的完成更加困难，所需时间更加漫长。在当代中国，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目标从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两个建设”到90年代中期包括“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三个建设”，以及本世纪初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领域的“四个建设”表明，执政党从关注国家建设（上层建筑领域）开始扩展到经济建设（市场取向）、社会建设（如文化发展、社会民生、培育民间组织等）的领域。

其实，从学术意义讲，执政党领导的社会建设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这里的“社会”对应的是“国家”与“市场”，从而构成一个“三分结构”)：一是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建设；二是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建设。作为规范性的价值观建设往往依赖于社会的自然演进或某些重大性事件的推动，是多重力量影响的结果。表面上看，并不能过分期期待政党或政府在建立新型的道德规范或社会价值观方面的作用。然而，在社会重大转折时期或发生重大突发事件背景下，政党或政府的引导可以成为建立新社会规范或价值观的重要保障。比起规范或价值观的建设来说，政党或政府对社会制度建设、社会结构更替的影响就要大得多，比如涉及到民生的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制度、公平受教育的体制、政策参与和社会监督机制、民间组织发展、各种公民论坛和社会网络建设等方面。当然，这是“立”的角度来谈的；从“破”的角度看，政党或政府对社会建设的“破坏”往往比其建构容易得多。比如，一个不公正的规则设计往往会使人们对机会平等报以绝望心态，进而寻求以非平等的方式去实现平等；一个大胆的政治谎言影响的不是执政党的一时一地，可能是社会诚信水平的长期、整体性的降低；执政党内部或政府机关的官僚陋习、不正之风会引致民众效仿，加速社会风气的恶化；政治斗争可能向“社会人”蔓延，使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意愿降低；权力与资本的高度结合会加剧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加速社会断裂，产生社会怨恨，等等。因此，从社会资本的角度看，一个优秀的执政党不但要主动去引导并建立适宜社会发展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建立社会公正、合作、和谐、信任、宽容的机制与体制，更要努力防范执政党的不当行为给社会建设带来的破坏性影响。

于是，这就给我们这些研究当代中国政党政治的学者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如何由研究执政党与国家、执政党与政府、执政党与市场的关系扩展到研究执政党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为此有必要提出一个中国式政党社会学的研究范畴。^①虽然本书不足以搭建一个全面的政党社会学框架，却足以提出一个研究政党领导与社会改造、社会发展的相关性的领域。我认为，当前，中国的政党社会学研究需要关注以下若干问题：

政党社会学与政治社会学是什么关系？作为社会学的分支，西方政治社

^① 在当代中国，执政党的独特地位与影响力也是促使我们由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取向转向政党社会学研究取向的动力之一。

会学关注“两个核心概念”和“三大主题”。“两个核心概念”是指“权力和权威”，而“三大主题”是指“制度、网络、文化”。在西方政治社会学文献中，政党历来是一个重要研究对象。^①而政党由于处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既是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桥梁，也分别属于国家或社会的一部分。当政党执政时，它构成国家权力的一部分；当政党在野时，由于具有监督执政党的功能，它也是社会力量的代表。从世界各国政党发展史看，政党的产生不外乎两种渠道：一是来自国家权力或上层社会的分裂，如英国政党的产生；二是来自于社会力量的聚集、社会运动、革命等，如兴起于19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20世纪欧洲社会的绿党、20世纪80年代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等等。无论政党产生于哪种渠道，无论其执政与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政党必须生存并立足于社会之中，自然需要各种社会支持网络、规划社会进步、构建社会诚信与互助、建立合理的再分配体系、引导社会道德规范的健康发展、塑造社会共同理想与目标，等等。由此看来，如果说，政治社会学更侧重于理论，那么政党社会学则更偏重于实务；政治社会学的范围更宽、更广，那么政党社会学的研究范围更窄，主要限于政党与社会的互动，如社会资源的使用、社会结构的改造、社会核心价值与道德规范的引导、社会互助与社会诚信的培养等。

我国政党产生的土壤与背景是什么？这是研究我国政党社会学的逻辑起点，即政党产生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土壤。“乡土中国”是我国政党产生的土壤与基础，据费孝通教授的研究，“差序格局”是“乡土社会”的典型特征。“差序格局”不仅是一种乡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结构化格局，也是一种道德礼仪的规范化格局。在“差序格局”中，人们依血缘、亲缘、地缘的亲疏远近而形成不同的义务与责任，并凭此确立道德规范。在“差序格局”中，人们尽管彼此相识，却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道德规范与义务，这是“熟人社会”的基本法则。我国政党产生的社会背景就处于这样一个现代化进程的大转折时期，即由相对不流动、封闭的“熟人社会”向流动、半开放、开放的“陌生人社会”转型的时期。政党如何开发与利用“熟人社会”中的文化资源，去建立一个适应“陌生人社会”的交往体系、道德规范、诚信与合

^① Anthony M. Orum,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ociology*, Prentice Hall, Inc., 2001, P2—5.

作格局，就成为当前我国执政党领导社会建设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中国共产党产生的时代背景是近代以来作为对西方文明挑战的反应的被动现代化进程。正如学者刘小枫所言，中国早期现代化任务的承担者是政府官僚（洋务派）和在野儒士，但革命志士推翻满清政权中断了现代化承担者的上层资源，承担者的重担转移到新兴知识分子身上。因此，中共早期的成员就是这样一批向往和醉心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知识精英。但是，政党成立之初，一方面由于工业化水平低，缺乏一支有力量的工人阶级队伍；另一方面，国家救亡的压力要求政党必须巩固其阶级基础。^①由此，寻找工人阶级作为阶级基础就成为中共早期建立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联盟）的主要做法。但城市工运的反复失败证明了工人阶级因数量小而力量弱，组织群众的工作重点自然就放到了农村，农民就成为中共最有力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的地位一直不容动摇，“文革”期间农民天然享用了“革命群众”的头衔就是证明。

中共领导的社会革命与社会建设的逻辑关系是什么？社会革命与社会建设是中共领导社会发展的两个主题。从字面上看，“革命”强调“破”，而“建设”强调“立”。改革开放前，社会革命被掀起了若干次高潮，一些乡土社会里形成的规范、礼仪、权力、符号等都成为“革命”的对象；改革开放以来，即使我们已经转向了社会建设的方向，但并没有放弃“社会革命”的思维。当前，执政党仍然肩负着向落后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体制机制、党内不正之风（如执政党与政府内部存在的官僚主义、官僚陋习）“革命”的历史任务。只不过，与“革命”相比较，“建设”是主要的。

改革开放以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城镇单位社会的瓦解的社会学含义是什么？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城市单位体制的解体，家庭的功能开始恢复，并重新成为生产、生活的主体。在社会规范方面，伴随着家庭功能的恢复，“私德”体系又找到了立足的土壤。“私德”体系对于规范“熟人社会”很有效，在“熟人”中间，彼此具有某种义务和责任，能相安无事。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了生产要素流动，包括劳动力流动，这加速了“陌生人社会”的形成。在“陌生人社会”中，“私德”体

^①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第394—395页。

系不再起作用，于是制假贩假、偷税漏税、不遵守合约等“道德失范”现象开始泛滥，当泛滥到一定程度，甚至会向“熟人社会”自身渗透，这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欺生”向“杀熟”转移；在社会结构方面，家庭的“解放”并不意味着立即出现了一个独立于执政党或政府之外且有自我管理能力的“公民社会”，这很容易使民众对执政党或政府在现实生活中的依附性与所追求的自治性矛盾交织在一起，混淆了当代中国社会中政治冲突与社会冲突的界线。以上两方面问题给执政党提出了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建立法治秩序与市场伦理、培育社会诚信、鼓励并引导“两新组织”发展、扩大群众自治等任务。

执政党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学含义是什么？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进入了新阶段，一个与80年代有着很大差异性的新社会正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这与三个背景因素有密切联系：第一是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这个转型加剧了在市场化因素主导下的城乡二元结构；第二是改革进入利益格局形成的新阶段，与人们关系最密切、利益最相关的那些改革是在这个阶段完成的，于是，形成了从利益扩散向利益重新聚集的分配新格局；第三是全球化的趋势以及中国更加深入地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加剧了社会在等级和分层结构上、在区域尤其是城乡社会中的“断裂”，一部分人在文化观念、社会生活等方面将从此与其他人失去社会的有机联系。^①正是针对由社会“断裂”或“碎片化”现象引起的社会怨恨和社会冲突的扩大，执政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把人与人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目标放在核心位置。其中前两项任务属于本研究的内容，亦即执政党如何去引导社会形成一个有诚信、合作、互助、礼仪的环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对我国乡土文明的继承，也是对现代文明的吸收；既要建立以个人权利为主体的“团体格局”，也要吸收“差序格局”中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由家庭伦理推及为社会伦理的中国式“博爱”精神；既要善于利用现代法治来有效管理社会，也不能全面拒绝从传统道德中吸取合理的成分；既要强

^① 相关论点参见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调“民生”建设，也要强调“民风”建设，二者不可偏废。

当前我国执政党领导的社会建设内容与方向是什么？当前，执政党大致采取了以下战略来推进社会建设：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去克服传统农业社会以家庭为载体的“私德”体系；打破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的交往结构，鼓励“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的发展。在城市，积极引导和鼓励民间组织发展，并成为城市社区建设的生力军。在乡村，大力加强新农村建设，鼓励农民走合作生产与经营道路，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积极推进社会协商，遏止社会“断裂”，培养基层民众的妥协意识、参与意识、合作意识，提升社会资本，为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准备社会土壤；抵制党内包括官僚主义与官僚陋习在内的不正之风，实现以党风带民风并最终改善民风的目标。

与经济建设相比较，社会建设不具有经济建设的“一蹴而就”或在短时间内就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效。社会建设具有长期性、全局性、战略性等特点，推进建设的主体必须超越各个阶层、部门的利益，着眼长远，放眼全球。因此，中共作为全国各族人民利益、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忠实代表，其领导的社会建设应该立足于中国文化与社会的现实，从吸收传统文明的精华出发，以理性却不忽视感性、制度化却不离开人性化、鼓励自治但却不搞对立、强调“立”却不忽略“破”的原则，逐步引导并调整社会规范与社会结构，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标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三

以上洋洋洒洒陈述了研究思路，却不敢忽略对写作准备过程的回顾。在整个写作过程中，不能不提到从学界泰斗的思想中得到的灵感以及在与学界长者交流中得到的启示。首先，要感谢一批学界泰斗，如费孝通教授（不幸先生已辞世），他的作品对我有很大的影响，读他的作品已经有十几年，每

读一次，感觉都不一样。本书正是以费老的观点为分析起点，正因为此，诚惶诚恐，站在名师肩膀上的滋味是不好受的，其压力非同一般。同时，对传统中国社会进行研究的还有一大批名声“响当当”的中外学者，他们是王亚南、张纯明、张仲礼、周荣德、黄宗智、费正清、白鲁恂等等，读他们的书，本人虽然愚钝，也尚能感受到其中的哲理与智慧，没有这些学者对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铺垫，恐怕不知本书从何入手；最后，国内对当代中国基层社会发展（主要是乡村和城市社区研究、单位社会研究、第三部门研究等）、经济转型、政治发展、党的建设研究的一大批学者的成果也给了我莫大的启迪和帮助，缺少这些成果的支持，本书就只剩下骨架了。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要感谢近年来深入基层社会调研过程中给予我支持与鼓励的朋友们。近年来，我曾深入到北京市东城区、深圳市南山区、内蒙古自治区巴盟前旗、浙江省温岭市、江苏省射阳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和伊犁地区、四川省南江县、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重庆市忠县、江西省井冈山市、广东省河源市、海南省三亚市等地的城市社区和农村基层调研，基层社会改革开放三十年变迁的风貌令人印象深刻。在基层探索中，各地在地方党委领导下开展的“和谐乡村”、“和谐社区”建设活动尤其值得一提。它们是：北京市东城区积极培育与发展民间组织的探索，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的社区建设及县乡两级干部深入乡村为民服务的大胆探索，深圳市南山区党组织在社区建设中发挥“嵌入”与“吸纳”作用、建立“三个全覆盖”、利用“五种工作平台”开展“和谐社区”的探索，四川省南江县南江镇的农民工协会、重庆市忠县的“百千万工程”、浙江省温岭市的“民主恳谈会”、江苏省射阳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蓬勃发展、新疆喀什在乡村扶贫中所建立的轮流信用组织如“爱心银行”，等等。放在全国13亿人口范围看，这些探索或许不太起眼，但探索者的每一项努力都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添了一块砖，加了一片瓦”。

这本书也是我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做博士后研究期间的一项成果，并荣幸地得到了全国博士后基金的资助。与我所选择的研究方向相比，本书有点“不务正业”，但是多年的积淀与兴趣仍挡不住我完成本书的热情。所以，一边探索自己的研究方向，一边培养自己的“业余爱好”，终于以“熬更守夜”的毅力完成了本书的初稿。感谢经济学院老师们的鼓励与支持，尤其是我的

指导老师——刘伟教授；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王浦劬教授，他始终如一地为我指点迷津，常常使我在研究停顿时茅塞顿开。

本书的完成还要感谢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教授。准确的说，这个题目是王教授的研究领域，他对此更有发言权。正因为此，每每在与王教授聊天的过程中，我总是有意无意地把本书的观点拿出来与他交流，而交流的火花以及受王教授独特见解影响而形成的观点也自然融合在本书的行文之中。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写作进行到关键时刻，书稿的内容已经显得并不重要了，思考在当下众人“急功近利”、“都尚奢华”的社会背景下“做人”的标准和“做学问”的态度已经成为了研究中的一个“副产品”，渐次成为主要问题，并无时无刻不困扰着我。正在此时，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关于如何“做人”以及学术方向的引导与教诲，使我颇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必将终身受益。谨此，向俞老师表示最真诚的谢意！

在写作过程中，我还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燕继荣教授进行过深入交流，并得到他的指点，特此感谢。作为国内较早把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引入到政治学研究的学者，燕教授对社会资本的理解非常深刻，每次交流，定能收获不少。遗憾的是，与他所倡导的“量化分析”路向不同，本书选择了“描述式”的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道路。对于如此宏观的题目，仅我个人的力量，难以具备“量化分析”的能力。

当然，作品出来以后，自然希望引起大家的关注，一是希望得到批评；二是希望得到建议。真理总是愈辩愈明，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角度即使看同一问题，其结论也可能大相径庭。所以，交流容易打开我们的思维，扩大我们的眼界。当然，无论找多少“借口”，也必须坦承此书中可能出现各种逻辑、立论或用语上的毛病；无论怎么“推脱”，也必须承担“文责自负”的义务。

最后，真诚感谢给予我帮助的老师 and 朋友们！真诚感谢读者！

祝灵君

2009年10月于中共中央党校